



《辞海》的前世今生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聂作平

1936 年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后来广为人知的事件:这一年,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宣告结束;这一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一年,作家鲁迅、前北洋军阀段祺瑞和曾经艳帜高张的名妓赛金花先后去世;这一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在这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之外,另有一件事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就其深远和绵长来讲,或许并不亚于同一年度发生的其它事件,但是,时至今日,却很少还有人清楚地记得。这,就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书《辞海》的问世。毫不夸张地说,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权威性和群众基础的辞书,诞生于 1936 年的《辞海》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追溯《辞海》的源头

《辞海》的新鲜问世是在 1936 年,但它的萌芽,却还要往前推上 20 年。众所周知,中华书局是中国所有出版机构中历史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百年老店,近百年来,中华书局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已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然而,有许多读书人却都不知道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先生。其实,陆费逵先生不仅是中华书局的创办者和早期负责人,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辞海》之父。

陆费逵原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母亲乃李鸿章侄女,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成年后,陆费逵曾先后出任过报纸主笔和小学校长等职务。1912 年 1 月 1 日,就在中华民国创立之际,他创办了中华书局,并很快将这家出版机构做强做大,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化名牌。1915 年,陆费逵决定编纂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这显然是一项浩大繁复的工程,虽有专人负责,但自 1915 年秋天启动,直到 1928 年的 10 多年间,工程进展却不如人意。这年由于另一位学者的加盟,才使得《辞海》的编纂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这位新加盟的学者就是著名教育家和出版家,同时也是《辞海》首任主编的舒新城。

舒新城是湖南溆浦人,在他 30 岁到 35 岁的 5 年之间,他竟以一人之力,编著了各类教育书籍达 17 种、400 万字之多。1922 年,舒新城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时,陆费逵应邀来校演讲。就是在这次演讲中,两人一见如故,从此订交。对于舒新城的能力和名气,陆费逵都觉得他乃是出任《辞海》主编和整个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的最佳人选。从那时起,陆费逵便有意请舒新城主持中华书局的编纂工作。翌年一月,两人再次见面时,陆费逵向舒新城提出请求,但舒新城以他不愿管理具体事务为由婉辞。

1925 年 6 月,舒新城因学潮由川被驱返宁,陆费逵再度萌生了邀请舒新城加盟的念头。当月,当舒新城来访时,陆费逵果然再次向他递出橄榄枝。但舒新城仍不愿意到中华书局就任,他对陆费逵坦言相告,说明他的理想是办一家私人学院,为了筹集款项,他想通过编纂词典来出售书稿。陆费逵与舒新城乃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之交,自然不便相强,却答应他将帮助舒新城的词典出版。1927 年 4 月,舒新城编辞典经济不支,希望陆费逵予以支持,陆费逵当即答应从 6 月份起,每月预支稿费大洋 300 元。正是在陆费逵的帮助下,舒新城手里的这部辞典才得以顺利完稿,并于 1930 年由中华书局以《中华百科辞典》的书名出版。对于陆费逵的帮助,舒新城铭记于心。1928 年 3 月,当陆费逵再次给舒新城写了封长信,约请他主持中华书局已启动多年却因故搁置下来的《辞海》的编纂工作时,舒新城为陆费逵这种三顾茅庐式的赤诚所打动,终于在当年 4 月 23 日,赴上海就任《辞海》主编。在舒新城的主持下,《辞海》的编纂工作终于在几年后完成,交于 1936 年出版发行。

在舒新城留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年记下的关于《辞海》的大量琐细工作,如定稿、发排、校对、定价、样张等等,事无巨细,舒新城均要亲自过问。尤其值得一说的是,1936 年的上海基本已成为中日博弈的主要城市,《辞海》中有一些条目涉及到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日方曾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华书局和舒新城施加压力,但舒新城顶住压力,坚决不同意删除。1944 年,当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最艰难的境地时,留守上海的舒新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了《辞海》缩印合订本的出版工作。该合订本以剪贴代替排字,既便于读者检索,又可节省纸张,从而降低定价,以便让更多的普通读者也能够拥有一本梦寐以求的《辞海》。1947 年,《辞海》合订本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一再重印,从而使《辞海》真正从专家学者的心头好走向普罗大众。对此,舒新城功不可没。比较遗憾的是,陆费逵先生没能等到他策划的《辞海》成为普通读者的案头书这一天。他于 40 年代初病逝。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陆费逵并不姓陆,而是复姓陆费。

今年,中国当代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辞典《辞海》,已于国庆前夕正式推出其时隔十年之后的最新版本(第六版),据新书发布会上透露,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在国庆期间上柜开售新版《辞海》的主体版本(五卷彩图本),目前首印两万一千套已预订一空,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从 1936 年到 2009 年,弹指一挥间,光阴已跑过 70 多个年头,而《辞海》这部对中国人影响至深的辞书,也已先后出版了六版。可以说,每一个版本《辞海》的出版,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辞海》几任主编(从左至右)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

《辞海》变脸史

1957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期间,接见了舒新城先生。接见时,舒新城向毛泽东提出了修订《辞海》和新编百科全书的建议。两项提议,都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毛说:“我极为赞成”。此后不久,有关部门就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了上海。1958 年,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舒新城出任主任、李俊民出任副主任。1959 年,又在上海成立了《辞海》编辑委员会,同样由舒新城任主任,罗竹凤、曹漫之任副主任。舒新城逝世后,由陈望道任主任。陈逝世后由夏征农任主任。修订《辞海》的巨大工程终于启动了。

1958 年开始编纂的《辞海》,这是对 1936 年版《辞海》的修订,也是《辞海》的第一次修订。在花费了 7 年时间之后,编委会编纂出版了《辞海》(未定稿),这是《辞海》的第二版。由于甫一出版,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未定稿始终没能成为定稿。

《辞海》的第三版于 1979 年出版,这是对《辞海》(未定稿)的修订,也是《辞海》的第二次修订。1979 年版《辞海》出版时,正值整个中国刚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民众读书热情空前高涨——那时候的青年人为了在图书馆占一个位置,不得不提前两三小时到图书馆门前排队。在这种读书热潮之下,《辞海》第三版可谓赶上了黄金时代,刚一问世,就洛阳纸贵。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叶,虽然每年都要发行几十万套,但仍然供不应求,不但有人通过内部关系黑市倒卖,甚至有的地方要凭结婚证才能购买《辞海》。

1984 年,《辞海》编委会开始编纂 1989 年版《辞海》。这既是对 1979 年版《辞海》的修订,也是《辞海》的第三次修订,是为第四版。1989 年版《辞海》增补了大量条目——其中不少条目是上一版修订时因为政治气候而不得不缺漏的。如社会学条目从 18 条增至 367 条,美学条目从 35 条增至 270 条,伦理学条目从 20 条增至

124 条,经济法、国际法从无到有,从而使各个学科形成体系。

1996 年,《辞海》编委会召开编纂 1999 年版《辞海》动员大会。1999 年版《辞海》是对 1989 版《辞海》的修订,也是《辞海》的第四次修订,是为第五版。1999 年版《辞海》一方面新词条激增,达 6000 多条,另一方面对原有条目大量进行修订,如“市场经济”条目,释文从 1989 年版的 40 个字增加到 430 个字,同时还新增了大量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条目。

新《辞海》新看点

《辞海》自诞生之日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修订。为了 2009 年版《辞海》的顺利问世,多达 2000 余名的专家、学者参与了新版的修订工作。修订的方式不外乎对入选条目进行更新、替换,乃至删除。

作为目前最新版本的《辞海》,2009 年版的《辞海》有何特点呢? 据《辞海》(第六版)常务副主编巢峰介绍,新版《辞海》收单字字头 17914 个,比第五版增加近 400 个,附繁体字、异体字 4400 余个;词条计 127200 余条,比第五版增加 4200 余条;字数 2300 余万字,比第五版增加 200 余万字;图片 16000 余幅,与第五版相当。本版删去过时或者已经不再使用的词目 7000 条,词条改动幅度超过全书的 1/3。

据介绍,与以往的几个老版本相比,2009 年版《辞海》具有以下几大看点:

一、增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相关系列条目,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条目系列化。

二、首次增收现代汉语,突破历版《辞海》只收古汉语惯例。“超女”“囧”等落选,“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入选。

三、首次增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作品,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条目的空缺。其中,《红岩》等作品入选。

四、陈省身、王选、华国锋、巴金、谢晋、叶利钦、萨达姆、苏哈托等人物首次入选。一大批反映科技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新词条将被收录,如“神六”、“纳米”等。

五、计划推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的《辞海》手持阅读器和《辞海》网络版。

初版问世于 1936 年、凝聚中国几代出版界和学术界人士心血的《辞海》,其每一新版的修订,都留下其所处时代的深深印迹。